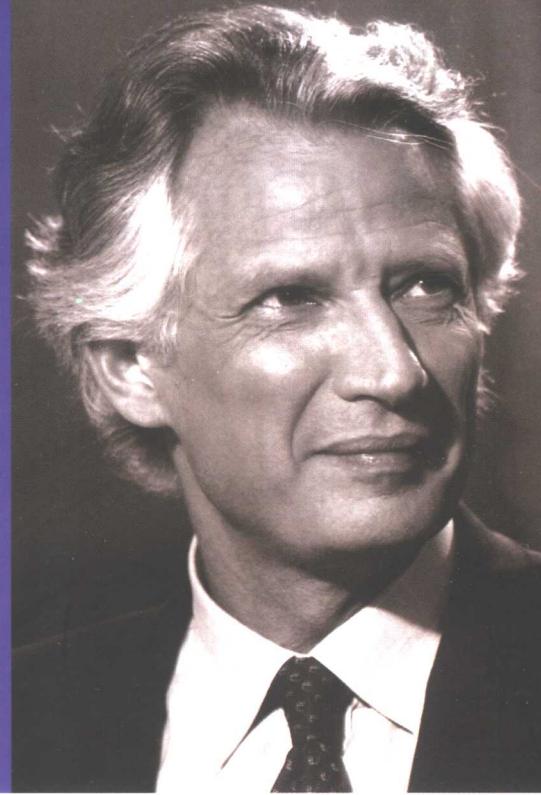


贝贝特人文馆

Le Requin et La Mouette

法国总理的世界理念
挑战美国的外交宣言

贡布洛维茨提醒我们说：
做法国人，就是要重视除法国以外的其它事物。



鲨鱼与海鸥

——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

[法]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著
马胜利 译

D. de Villep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e Requin et La Mouette

贝贝特人文馆



鲨鱼与海鸥

——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

[法]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著

马胜利 译

D. de Villeneuve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LE REQUIN ET LA MOUETTE

by Dominique de Villepin

Copyright © PLON 2004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 - 2005 - 0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鲨鱼与海鸥: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法)德维尔潘著;
马胜利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 - 5633 - 6025 - 5

I . 鲨… II . ①德…②马… III . 外交政策 - 对比
研究 - 美国、法国 IV . ①D871.20②D856.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05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65mm × 65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48 千字 图片:9 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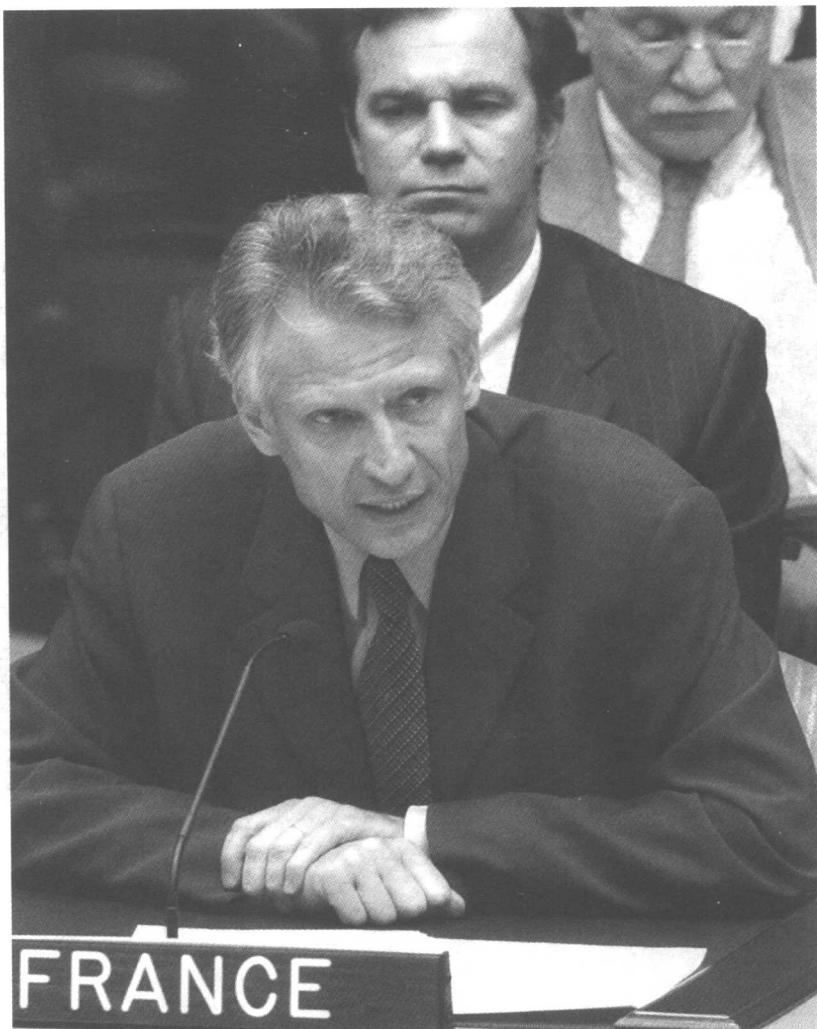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6 000 定价: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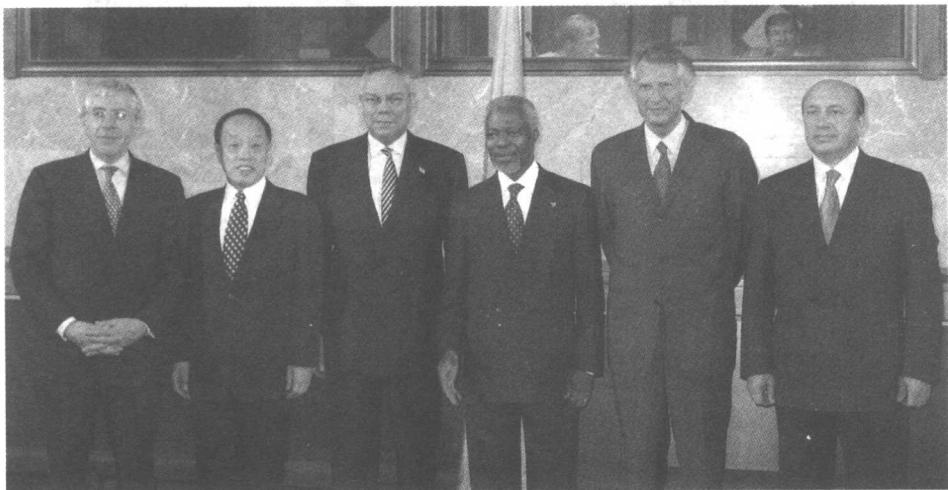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德维尔潘在国际讲坛阐明法国的立场。



德维尔潘敢于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说“不”。



德维尔潘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等在一起。



德维尔潘与萨尔科齐：同一阵营的对手。



德维尔潘是个工作狂，他还经常与家人一起体育锻炼。

译者序

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即美国和法国。美国独立后曾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它介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由于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而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便逐渐形成了普世主义的传统，并自喻为“人权的祖国”和“民主的象征”。在众多法国人眼中，法国不仅超凡脱俗，而且负有神圣使命。他们坚信自己肩负着启发、拯救和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的神圣更是笃信不移：“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①

“大国梦”长期萦绕着法国人。既然是“梦”，就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强大，使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挑战。因此，保持大国地位便成为法国外交的重点。从拿破仑三世到戴高乐，法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旨在恢复大国的光荣。戴高乐毕生追求实现法兰西的伟大与独立。他执政后的所有政策都以此为最高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却又谈何容易。冷战期间，身为“中等强国”的法国曾成功地利用美苏矛盾，联合欧洲来加强自身地位，达到了“用二等车票乘一等车厢”的目的。

^① Ch.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Paris, Plon, 1970, T. I, p.1.

戴高乐有一套完整的全球战略：打破美苏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坚持独立防务；对美既联合又独立，对苏既对抗又对话，既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又借助苏联制约美国；建立以法德为核心、排除英国、以法国为领导的“欧洲人的欧洲”；通过“缓和、谅解、合作”逐步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最终走出“雅尔塔”体系；打着“独立”的旗号，以“合作”的名义，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势力和影响；保住非洲，插足中东，重返东南亚，打入拉美。^① 戴高乐外交的独特和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在充分调动法国实力的同时，善于运用法国的传统影响和文化、精神力量以及他个人的声望，用富有胆识的外交政策和巧妙的策略，弥补法国实力之不足。保罗·肯尼迪曾指出：“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 4% 的国家可能寄予的期望，而且不仅在戴高乐总统任期内是如此。”^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法国对外战略目标与其实力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1989 年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法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多。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在综合国力，法国在这方面已落在德、日之后；法国的政治地位也趋于下降，对其至关重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此外，军事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明显下降，使法国核力量的重要性已大为减弱，所以它不得不与北约达成妥协，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更加借助欧盟的力量。尽管如此，法国始终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在当今西方大国中，法国与美国的摩擦和冲突最为频繁。实际上，两国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方面

^① 参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99—100 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伦敦昂温·海曼出版社，1988 年，第 428 页。

也基本一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与法国结盟。在二战中，美国的参战对法国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后，东西方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背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把整个西方世界置于自己的保护和控制之下，这自然会引起崇尚独立自主的法国人的不满：受美国人的保护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从 60 年代起，戴高乐便着手实行独立防务政策，建立起自己的核威慑力量。1966 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法国领土。冷战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与法国的大国雄心产生了冲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带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它极力阻止北约控制欧洲防务，抵制美国文化在欧渗透，并认为 NMD 危及法国的核大国地位。“9·11”事件后，法国不想无条件地追随美国，尤其不愿卷入对阿拉伯世界的“圣战”。它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唱反调的突出表现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还清楚地记得：2003 年 2 月 14 日，在美军向伊拉克开战的前夜，作为浪漫的法国人的代表，德维尔潘在安理会向美国、向全世界用诗的语言谈论战争与和平：“在联合国，我们是理想的守护神，我们是良知的捍卫者，那属于我们的沉重责任和无限荣誉应该引导我们给和平地解除武装以优先权。”接着，他用目光扫视在场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我的法国，一个古老的大陆，我的欧洲，今天要向您说的话。”德维尔潘的此番讲话立即激起国际舆论的热烈反应，也在美国招致了一场声讨大战。

法国人的“反美情绪”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也是金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法国报刊上时常刊登揭露美国的阶级差异如何巨大，社会问题如何严重，对外政策如何霸道的文章。崇尚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批评美国缺乏民族传统，说美国人标新立异、放荡不羁、狂妄自大、牛仔习气……法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很容易使人联想

起没落贵族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嫉妒和不满。早在 19 世纪中叶，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表述了美国消费社会的特征。他并不喜欢这种“大众社会”，尽管他相信这是大势所趋。法国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托克维尔有同感。1930 年，著名作家杜阿梅尔(G. Duhamel)在访美后带着惋惜和无奈的口吻写道：音乐被压入唱片，戏剧受到电影排挤，快餐店取代了小餐馆，所有艺术和生活方式都旨在满足大众需要。没有封建等级传统的美国提供了不同于法国的新型社会文化模式。而在自认为高雅的法国人看来，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反文化”或“没文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法国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法国的最大矛盾。法国人一贯以自己的高雅文化自豪，但无奈的是，阳春白雪，和者必寡。面对当今美国文化称霸天下，这种自豪便转变为一丝酸楚。目前，法国人尤其不愿接受“全球化 = 美国化”的观点。以反美情绪强烈著称的法国前外长魏德林多次强调法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他说：“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拥有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避免野蛮的全球化，用另外的方式规划全球化。”^① 然而，随着国际地位和作用逐渐改变，法国也不得不调整它的外交战略。尽管法国政治家们难以放弃普世主义的理想和大国的光荣与梦想，但他们越来越感到，法国的目标和理想只能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实现。

马胜利

^① 参见魏德林 1998 年 5 月 13 日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报告。

序 言

自古以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人类越飞越高。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人类总是不断地走向光明。但是，眼前众多的征兆不能不使我们提出疑问：难道灾难已经降临？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之间发生了多少分裂！有多少不同肤色、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狂热地依恋他们的符咒和图腾，从而远离那个在山脊上默默地大步攀登，并开辟通向开放精神之路的人。

本书写作的初衷是遵循原有的捷径，借助新鲜资料来探索历史学、哲学和文学，不向时髦和恐惧作丝毫退让，而是沿着悬崖攀登，在深渊边缘接触生活。在那里，经历过暴风雨的鲨鱼与海鸥继续它们激烈的对话，渴望实现它们彩虹般的结合。

本书的写作基于如下信念：只有法国将目光转向人类普遍价值标准和敢于拥抱其他地方时，它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于自己。我们的国家担负着传播希望的使命。它有能力开辟正义前景，平息恐惧和仇恨的喧嚣。作为中等强国的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吗？不一样。法国是一个为各国人民效力的强国，一个受人期待、期望和倾听的强国。它崇尚宽容、民主与和平的价值观。在过去数百年中，法国致力于实现人类普遍价值，并曾用武器和法律捍卫之。如今，这种普遍价值唯有在尊重和交流中才能生存。

我怎能忘记父亲在国外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法国广播时的激

动神情？在共和国总统身边时，我在阿比让、贝鲁特、阿尔及尔、雅典也曾感受到这种激情。傍晚，在办公室里，他历数着一些城市、国家或种族的名字，向我展示某国人民或某个已经逝去或即将来临的时代的宏伟画面。这使我感到，法兰西精神始终在发挥激励作用。

武力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需要胆魄、渴望和热情的时代。因此，热衷交往和喜爱远方者会借助陡坡凌空飞翔。当心灰意冷时，应当在黑板上、在地窖或阁楼里、在墙壁上写下“希望”二字。

4月的一个星期天，这一责任再次出现在我面前。那是在我到位于博沃广场的内政部任职后的几天，当我巡视部机关大楼时。这座当年的国家保安部大楼曾被盖世太保征用。当我看到保留战时原状的3间牢房时，不由感到震撼。两间牢房位于索赛街一侧的第5层楼，第3间牢房位于康巴赛雷斯街一侧的第3层楼。从1941年起，有数百位法国男女抵抗战士曾被关在这里。他们年龄各异，社会地位不同，但都遭到了审讯和拷打。在牢房的墙壁上，他们用现有物件，如别针、木签、铅笔芯，甚至指甲写下了最后的遗言。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大部分文字都属于表达鼓励和希望的留言：“想想那些在外边为解救你而工作的同志们！”“永远不招供！”“高内留斯鼓励所有难友要勇敢。一句话：永不招供！”“要有种！”“自信能增加耐力，不怕头浸水和其他刑法——恶心！”“大家坚持下去，我们不久就能战胜他们！一个因逃跑而被判死刑的洛林青年。”有的字体因岁月久远而斑驳不清，但内容仍能打动人：“斗争……”“……抵抗！”“……不说……”“……永远……”“……勇敢……”梅格雷、马赛尔、波蒂·鲁、加朗、阿尔萨斯·杜邦、雷蒙、莫尼克、P.E.、P.B.、R.P.……在这些名字或化名背后跳动着一颗父亲、姐妹或朋友的心。

做一个法国人多么光荣！我们国家处在不同时代和世界的交

汇处,它被一种热情控制着。这种热情既会伤害和折磨我们,也能使我们找到自我:忠于一种回忆,把向我们的地球注入意识和灵魂作为使命。今后的战争不是善与恶、这几个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厮杀,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战斗,是威权与宽容、残酷与友爱之间的冲突。

经验使本书的思路得以成熟。我愿与读者分享这些经验。今后,在法国以外发生的一切都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从外交部到内政部后,我曾估算这其中的延续性在多大程度上超过断裂性,无论是在捍卫我们的理想和原则方面,还是在反对仇恨、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恶魔方面。世上没有相互隔绝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而只有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的共同命运。

今天,从马赛到京都,从里摩日到墨西哥城,形成了同一种目光和同一人类共同体的空间。从此,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的所有严重挑战都在世界范围的棋盘上开始运作。我们不要把这视为一种威胁,而应将其看作运动和适应的需要,当作享受地球馈赠和恩泽的机会。但愿这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宽容和更美好,使我们放弃内讧和敌对,忠于我们国家的精神。但愿这会释放我们的能量和雄心,使我们在全世界表现出自己的才华、知识和特长。但愿这也使我们更注重在国内落实我们的原则,实现我们在自由、团结互助和机会平等等方面的要求,使任何人不被遗弃路边。力图使水火相容是永恒的法兰西精神。是的,我信奉这种大胆的精神,并坚信1789年大革命缔造的人能够永生。

为保障我们同胞所向往的安全、进步、增长和活力,我们应开阔视野,走向国外,更好地学会了解周围世界。我看到,为对付黑色海潮、水灾、森林大火等严重灾难,在我们为打击贩运毒品和恐怖主义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中,与我们边界外的欧洲朋友开展密切合作是何等重要!我曾盘算,在对付移民现象和犯罪网络时,如果我们能与饱受该祸患之苦的国家建立起互助关系,这项工作将会

提高多少效率！在交流与开放的时代，闭关自守是错误的。用理想和原则武装起来后，我们完全能泰然面对外来的目光，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我们有责任以宽容精神捍卫那些令我们充满自信地与他人开展对话的价值观念。我们有责任选择世界。

* * *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革命时期，但没有人能理解这种动荡的原因和结果。过去的确实在瞬间分崩离析了。新的规则正在形成，新的秩序正在建立。所有威权基础都受到质疑。这一断裂时代呼唤着觉悟的突发，唯有这种觉悟能够使天平向正义一方倾斜，只有这种觉悟会使我们重新找到和平之路。

人民陷入犹豫不决之中，他们不知道该服从哪个权力或神灵。这种犹豫不决有助于最简单化的言论和最激烈的要求披上合法性的外衣。昨天，鼓动仇恨受到鄙视，如今却得到响应。在全球各地相继传播的极端主义导致野蛮行动频频发生。如果我们不能选定方向，其他人便会代我们作出选择。我们中间最坚强、最坚决和最勇敢者将能够确定世界的前进方向。

今天，一些饱受动荡之苦的国家可能会投靠那些许诺最多、最会张扬，甚至是最为激进的人。因此，对它们而言，良知的准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对正在寻求自身命运的欧洲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应当环顾周围，踌躇满志地投身于多样性的环境。我们要学会从探索新世界中汲取能量。新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并蕴含在每个人的觉悟当中。这种觉悟应在分裂与和解之间作出选择。这就是新的舞台，一座真正的革命舞台。

能够起作用的首先是人们与自身的和解。因为，只有每个人都与自身的文化紧密结合，并保持其生动的回忆，他才可能与他人展开真正的对话。认同是多样的，它们是各个大陆的财富。但是，只有当每种认同都得到承认并获得他人尊重时，它们才会得以充分弘扬。

其次,能够发挥作用的还有人们与他人的和解。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他人是发现和探索的对象。奴隶制度和殖民化并不能使我们忘记争取对话、分享和自我审视的主张。对陌生人的感受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今天,他人经常引起过多的恐惧和怀疑。人人都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因为他们害怕自身的权利和特性受到侵害,担心遭到别人的侵犯或误解。而这种误解则可能导致相互冲突。敌对和无知酝酿着文化和宗教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种冲突,便不能避而不谈它的危险后果。

最后,能够发挥作用的还有人类与环境的和解。我们拥有足以摧毁和消灭我们星球的手段。我们正在铤而走险,即无可挽回地破坏着保证我们生计和生存的世界。掌握了源于技术进步的新型力量后,我们便负有一种责任:保障我们子孙的生活环境免遭严重破坏。环境不应是被盘剥的对象,而应成为受保护的资源。

的确,觉醒源于持续的意志。世界正处于迷惘中,它滋生着对立物,也勾画着新前景,并使人回想起过去的恐惧。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天有不测风云:清晨还是阳光灿烂,傍晚便会乌云密布。在随意的寻觅中,我试图解析那些导致当今现实的缺陷及其根源,以便识别方向性的错误和看清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找到可以停泊的港湾。世界的现状就是如此,它集正剧和寓言于一身。

过去,我们曾以为人类到达了历史的终结,即彻底实现了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自由民主模式。上个世纪末,许多人也曾认为种族灭绝和人类核末日的恐惧将一去不复返。这是崇拜现代性的世俗宗教的乌托邦幻想。在经历了宣扬屠杀的意识形态、疯狂追求纯正和大清洗,以及有悖人类良知的技术之后,难道不应出现一个和谐与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吗?这种假设并非荒谬,因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目睹了若干年前不可想像的大动荡。“9·11”事件使这种希望有所收敛。该事件以最突然的方式再现了记忆中的

创伤和历史上的暴力,好像历史是用同一张永恒的隐迹纸写成的。

我们选择了发展就要应对不断增加的危险。污染、核扩散、新流行病现已成为全球性危险。灾难性的全球未来封闭了我们的前景。根据传播甚广的说法,当今世界已失去灵魂和冲动,正被经济自由主义和科技的压路机碾碎。经济自由主义既无节制又无道德,而科技则富于征服性又缺乏人道。到处散布着警告性的异常气氛:被绑在现代化战车上的社会面临着威胁。四面八方的灾难预言家喋喋不休地宣扬没落论,而他们的听众大有人在。

最终,怀疑在它的发源地——欧洲文明中重新出现。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并同时构成我们自身最大的优点和缺点:优点表现为拉开距离,作批判性审视和实现超越;缺点则表现为怯懦和缺乏执著。

然而,有一种能力是任何威权都不能剥夺的。这便是开创的能力,它甚至也是人类自由的标识。我们拥有这种能力。我们不仅应享受它带来的喜悦,还应克服它造成的胆怯。因为,我们如今正处在十字路口,必须作出选择。面对无序状态和危机与威胁造成的严重混乱,我们或是知难而退,随波逐流;或是相反:集中力量以求一搏,实现新的崛起。

身处漩涡中心的我们应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意志。当今时代的困境在于:我们正在加工一种熔融物质,时间不等人。放弃将是最坏的选择。从科学到经济学,从国际关系到艺术,在所有的领域中,如果我们想使进步恢复活力和意义,就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人类的基本伦理。

我们应学会从过去汲取树立新意志的能量,而不是留恋业已逝去的黄金时代,只有这种信念才能使我们克服不幸的厄运。世界人民和各个国家有办法重新洗牌,预言的灾难尚未发生,文化和宗教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世上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意识,它决心挫败这些诅咒,创造共同生活的条件。我们手中把握的杠杆能